

程骏迪喊上同样水性好、也有划中国传统船只经验的业务股长王炳耀，又说服了船库保管员曹德钧，在当年夏天的一个凌晨，开始了尝试。他们悄悄地把一条赛艇放进苏州河，结果第一次上去就翻了船。那一天，不知翻了多少次船，喝了多少河水，但他们毫无放弃的念头。两周之后，就可以把赛艇划得有模有样了。新中国第一批赛艇人就此开始成长。后来，这三个人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赛艇教练。

1955年，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独臂将军”蔡树藩来到上海划船总会的船库，摸着船艇，欣喜地说：“这些船都是宝，要爱护好利用好，把我国的划船运动开展起来。”

他传递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要开展划船运动，计划先在上海培养骨干，以后再推广到有江河湖泊的城市，还要参加国际比赛。不过，苏州河与黄浦江上船只太多，不适合训练，要造一座新的划船基地。最后，上海划船俱乐部选址在了当时上海县港口镇的黄浦江畔。

1956年，上海的第一支业余划船队成立。当年11月在杭州西湖举办的全国四城市划船赛上，上海队包揽了男子项目的全部4个冠军以及女子项目的2个冠军、2个亚军。这样的表现在全国引发了极大反响，也推动了赛艇在上海的快速普及。

上海的首期划船辅导员培训班在1957年3月开班，大学、中学、政府机关和工厂都选派骨干教练参加。时任上海划船队总教练的程骏迪为他们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赛艇教材。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自单位组织基层业余划船队，“雪球”越滚越大。当年8月，上海第一届全市划船锦标赛上，参赛单位达23家，运动员超200名，下水赛艇有80艘，超千张观赛票销售一空。到1958年，在上海划船俱乐部训练的业余队

上海选手陈云霞（左一）、张灵（左二）与队友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冠军。



伍达到300多支，就算有200多条赛艇、1000多只桨还是不够用，只能分批下水训练。每到周末训练时，划船俱乐部总是人声鼎沸，岸上助威呐喊，水中百舸争流。

群众赛艇开展得有声有色，竞技场中的上海队也再创辉煌。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上海赛艇队将男子项目全部金牌收入囊中，并取得女子项目的一金两银。

“东方日内瓦”与五运“一日十金”

遗憾的是，随后“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先后到来，上海的赛艇运动逃不过冲击，陷入沉寂。

终于，在1973年，上海的赛艇运动开始恢复。停滞已久的事业要捡起来，谈何容易。恢复后的上海划船俱乐部已没有原来的建筑可用，要沿江填土造地来建设运动员宿舍、船库和码头。

1975年，填土用的3000立方米石料运到了码头，却无人卸货，只能靠划船俱乐部自己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每块石头都有一百多斤重，搬卸的时候脚下还有其他石头绊着，每个人都跌跌撞撞累得眼冒金星。运动员们半天训练，半天搬石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让这些石料得以上岸，让自己的新“家”有了基础。

“文革”结束后经济秩序逐渐恢复，上海赛艇队日常训练的黄浦江与淀浦河上的船只越来越多，而他们要为1983年在本土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奋力备战。1978年开始，他们借用郊县河网地带的临时场地训练，其中一站在南汇大治河畔。那里风平浪静，毫无船只，对赛艇训练而言条件极佳，但四周荒凉，

赛艇运动员在酷暑中加紧训练。

